

代表委员谈青少年追星问题

斩断追星乱象背后利益链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近年,饭圈中的氪金 应援 流量为王 等乱象愈演愈烈。今年两会,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此予以关注 相关建议从会场火到舆论场。

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青少年的价值观引领,影响到他们健康成长了。全国人大代表、泰安市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宋文新说。

多位代表委员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追星乱象背后存在利用粉丝牟利的黑灰产业链,部分青少年成为受害者,法律监管上有诸多空白亟待填补。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告诉记者,她在网络消费借贷案中,发现了一些新现象、新特点:在校学生互联网金融借贷案大部分是因粉丝应援等追星行为产生的,涉及直播打赏的案件94%以上都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金额少则几万元,多则上百万元。

现实中,未走入司法程序的案例数量更多。陈海仪在走访一些学校和家庭时发现,一些几百、几千元的打赏,由于很难找到直播的实际地点,打官司成本也相对较高,比较麻烦,就不了了之了。

全国政协委员、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韦震玲长期关注未成年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她并不反对青少年喜欢明星偶像,她认为,崇拜明星、偶像是每个人在成长阶段大概率要经历的。青少年喜欢明星,可以树立榜样以激发自己努力进步,我的偶像很优秀,我也要优秀,向明星的优秀品质看齐,从正能量来讲,这种正确的引导都是很不错的。

韦震玲认为,粉丝文化已成为拉动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有积极的一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引导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去疯狂追捧。她说,比如集资给明星送金条、奢侈品等应援礼物,收买营销号为明星及相关公司打榜带流量,网络骂战诋毁诽谤其他明星或明星的粉丝,逃课去帮明星造势,花钱请人在机场代拍,侵犯他人隐私、扰乱公共秩序。这些已经不是简单的不良追星行为,有的已涉嫌违法犯罪。

在审议 两高 工作报告的小组会上,韦震玲提出 重视整治粉丝文化乱象 的建议。她表示,现在出现的种种乱象对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了错误导向。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有资本、有利益在里面,促使这些孩子在社会娱乐环境中被渲染。随着对青少年追星、饭圈文化的关注,宋文新发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在涉及追星经济利益的乱象中,我们可以紧紧抓住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点,对明星、经纪公司等平台不

当引导或者不当营销行为给予相应的规管。陈海仪表示。

她解释,比如在一些粉丝 应援 活动里,有明星接受佣金这么贵重的消费品,如果涉及未成年人,这种行为必须得到监护人同意,也就是法定代理人必须要同意。如果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的话,这种赠与不能成立,可以撤销,明星本人必须返还礼品。

在这些乱象中,起到重要组织动员作用的是明星的粉丝后援会。韦震玲说,演艺明星的粉丝后援会在运作上实际已经是社会组织,通过网络组织人员、筹集资金,号召粉丝买明星代言的产品,具备了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对于它们的约束、管理目前是真空状态。

上海民建建陈府申律师对粉丝集资提出过专门建议,粉丝后援会通过 打榜 刷票 买广告 以明星或后援会名义参与公益等方式实现对偶像明星的 应援。显而易见的,上述 应援活动的开展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一般通过粉丝后援会自行筹措,筹措资金的总量动辄达到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存在筹资过程中因粉丝后援会及实施主体的不当行为而构成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及侵占罪的刑事法律风险。

韦震玲建议,粉丝后援会应该在民政部门登记,明确责任,规定权利、义务。能组织做什么活动,是否能够筹集经费,在哪个层面筹集,必须按照相关规定登记备案,依法开展活动、接受年检。

从明星本人角度来讲,宋文新说,如果明星偶像自己愿意被资本绑架,愿意做 流量王,那是自身的价值观有问题,明星偶像应该担起社会责任,经济利益应当放在第二位。

首先你是一个社会公众人物,你的价值观对未成年的孩子影响很大。

韦震玲说,演艺明星作为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收受应援礼物等不良行为本身是不道德的。对青少年和大众的认知方面有良好的导向,明星所在的公司也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在合约管理上对明星行为加以约束。

需要行业规范和市场的监管,缺失的应该尽快补上。宋文新说,整顿追星乱象是一个多方形成合力的过程,还需要学校、家庭多方配合,不是短期内呼吁两次就能改变现状的。

(孩子)直播打赏或者追星应援的行为通常10次以上,父母才会发现。陈海仪说,家庭方面对孩子在追星爱好以及在互联网上的消费行为,掌握的情况并不多。她建议,家长和学校应该对孩子在追星方面多给予观察,正确引导,不能等钱花大了、影响学习成绩时才干预。

韦震玲建议,两高 在治理粉丝文化领域乱象时,应与有关部门联合,从司法角度加大治理力度,还粉丝文化一片晴朗天空。

宋文新表示,自己连续呼吁、提出建议,希望推动未成年人社会成长环境的优化,让正能量的偶像引领和青少年理想信念的教育更好地结合,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每年高考之后,很多学校门口都会点名道姓、图文并茂地张贴 我校×××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 我校×××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 以及我校有多少同学被985(或211)高校录取的大红喜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说。

刘焱指出,学校门口介绍学校情况和历史的宣传栏里,都把毕业生里出了几个院士、教授、名人等作为学校的金字招牌和办学质量的保证。在这种 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 的压力之下,刘焱认为,我国大部分中小学生学习得太苦太累。

刘焱表示,能够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凤毛麟角,考上985或211高校的学生数量也不会多。这种宣传完全不顾及大多数学生的自尊自信。难道考不上北大清华、考不上985或211高校的学生就没出息,就一定不能成才?刘焱说:这种宣传,助长了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倾向,加剧了学生和家对于升学的压力和焦虑,把所有学生和家都驱赶到 五唯 狭窄的人生赛场,已经成为阻碍我国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必须加以改变。

如今,北清率 升学率 成为不少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的标准。不少代表委员认为,这样的导向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发展。

重奖励不重基本待遇保障,优秀教师招不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说。

这两年,张志勇调研发现,有的县(市)高考奖励额度很大,动辄数千万元,这些奖励的发放都是根据当年所谓高考成绩确定的。现在,各个县市的高中布局很不平衡。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优秀师资和生源越来越向个别最优秀的高中集中。这样,在一个县域内,高中布局就形成了 金字塔 形态。

然而,县里把大量的钱都用于每年的高考成绩奖励,这已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很难拿出更多钱用于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张志勇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刚刚入职的本科生教师月工资只有2700元,本校毕业的省属师范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回母校工作。

这为当地高中教育的健康发展埋下了极大隐患。张志勇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因此,张志勇建议,改革和调整中小学教师业绩奖励体系,要保证教师业绩奖励资金来源,科学确定教师业绩奖励额度、标准和方案。

中小教师的业绩奖励固然要看教学业绩,但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把本校学生身心健康素质,特别是体质监测结果纳入全校教师业绩奖励考核系数;二是要考虑每所学校学生学业成绩的增值水平;三是要突出教师教学业绩的团队奖励,特别是学科教研组、行政班等教学集体的奖励,而不是仅仅奖励毕业年级的学科任教教师;四是要重视对教师工作量的考核评价,包括教师承担的教研、科研、管理和学生等工作。张志勇说。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

刘焱认为,教育评价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学校门口的标语和宣传栏反映学校教育评价的价值导向,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行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深刻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和社会教育生态。

刘焱建议,教育部发文明令禁止学校张挂这种人为制造攀比、加剧考试竞争和焦虑的标语和横幅,多宣传毕业生中爱岗敬业的普通劳动者,塑造尊重普通劳动者、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人人皆可成才 的社会教育生态。

58.8%受访者希望引导青年理性追星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周易

青年对文化领域有什么关注和期待?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2021年全国两会青年期待 调查显示,58.8%的受访者希望引导青年理性追星。34.4%的受访者强调 要整顿娱乐圈和网络乱象,让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宋文新谈到 饭圈文化 和未成年人 偶像观 的养成时指出,良好的偶像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理性地崇拜偶像,可以帮助未成年人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如果不理智追星,会起到负作用。

做策划工作的程菲(化名)告诉记者,粉丝社群并不是外界看到的那么简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现在的粉丝群,对于艺人和普通粉丝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他们一方面帮助有炒作需要的艺人塑造人设,另一方面帮助一般粉丝追星。

宋文新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一定要肩负起传统媒介文化育人的社会责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主流媒体声音以及自媒体的正能量声音反馈给未成年学生,让他们担起社会责任。



3月10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三场委员通道上,工作人员在更换话筒海绵。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李静超/摄

幸福微实事 让群众走向社会治理 前台

苏州吴中高新区唱响 百姓定实事政府做 合奏曲

新年伊始,苏州吴中高新区高标准谋划部署新一年幸福微实事 各项工作,切实推进 幸福微实事 品牌深入人心、落地见效。从和谐微实事 到幸福微实事,吴中高新区始终聚焦 民生幸福 这个关键,持续探索创新基层治理工作。2019年,吴中高新区东吴、吴中苑两个社区作为试点推进社区参与式治理,6817名居民投票选出了14个民生项目。2020年,实施范围扩大到运河以北11个社区,总计征集意见5万余条,参与群众超3.6万人,参与率超30%。幸福微实事 已经成为当地社区治理居民参与度高的项目。

幸福微实事 已经成为当地社区治理居民参与度高的项目。

群众从过去的 我看 到现在的 我定。

2019年,吴中高新区在两个社区试点,拉开了 小协商 连接 大民生 的序幕。2020年,项目扩大到11个社区,参与度更高,参与主体更广,实事落地的时间更快,群众的归属感更强。今年,吴中高新区提炼总结好的经验做法,把 和谐微实事 升华为 幸福微实事,并在20个社区进行全覆盖推广。通过思路的调整,一步一脚印,幸福微实事 成为政府和社会 共治善治 的见证和媒介。

此外,幸福微实事 让群众走向社会治理的 前台,从 背着手指点 到 放手参与,有效扫除政府对居民需求掌握的盲点,用精准施策有效化解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切实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

幸福微实事 点燃自治激情

在实践过程中,吴中高新区探索形成了方案共定、建议共提、筛选共议、项目共决、群众共督、意见共商、家园共建、成果共享 八步工作法。吴中高新区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广泛。社区居住、学习和工作的居民,都可参与提议、协商、投票,30%以上的参与率位于苏州市此类项目首位。

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居民小组长、网格员、业委会、社会组织、专家智库、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全员行动,讨论协商每个环节都显身影。项目由居民提议和投票表决,实现 政府配菜 向 百姓点单、为民做主 向 由民做主、单元供给 向 多元参与 转变。这些实施项目延伸到社区的边角角落,居民最大限度地共享项目带来的红利。

通过民主协商,吴中高新区架起了沟通 连心桥,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以民议汇聚民意,让民声决定民生,使每一个决策都来自于民、服务于民,既增强了政府公信力,也让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快速落实,彰显出政府为百姓服务的诚意。

社区参与式治理让居民有更多 主人翁 的体验,增强了居民的民主意识、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使城乡社区

治理的源动力和内聚力不断增强。同时,这也让基层社区干群关系更为融洽,群众更愿意参与社区事务,居民更加信任和支持政府以及社区工作。

赋予 幸福微实事 更多新的色彩

通过社区参与式治理,吴中高新区切实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加强居民自治上深化研究、持续探索,吴中高新区努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在 微实事 基础上,吴中高新区逐步推行 院落自治 楼宇自治 等微自治 方式,及时解决 微难题 微矛盾。在此过程中,吴中高新区建好用好 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 微平台,让更多居民看到 与己有关 社区事务,主动投身到社区建设中来。

通过配以丰富多样的文体娱乐活动、慈善公益活动,吴中高新区让居民在商量提议、拉票投票、监督落实中相互走动,改变楼道邻居少有往来、小区居民互不认识等状况,调动群众参与进来、互动起来。

围绕小区改造、环境治理、垃圾分类、移风易俗等一批民生关键事,吴中高新区不定期开展协商,拓宽社会捐助面,撬动社会资本深度参与治理,激活社区治理的 一池春水,并采取 线上+线下 方式,拓展网络投票途径,多渠道激发居民参与治理积极性。

吴中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幸福微实事 社区参与式治理已经成为了高新区民生实事的特色品牌,实现了从政府配菜到百姓点菜、从 为民做主 到 由民做主、从一元供给向多元参与的有效转变,对推动高新区高质量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此外,幸福微实事 实现了 政府定实事政府做 的独奏,向 百姓定实事政府做 的合唱转变,增强了居民的民主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广大社区居民 自我参与、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实现了群众需求精准匹配、服务供给深度优化,切实增强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数据和信息来源:苏州吴中高新区) 广告

疫情之下 留学生何去何从

人大代表建议建立留学生回国学习衔接制度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见习记者 杨洁

在疫情的笼罩下,留学生成了受影响最大的学生群体。他们当中,有因疫情无法返回原学校就读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有因提前回国无法正常办理就业落户手续的毕业生、有因疫情只能留在家中上网课的留学新生。今年两会,留学生受疫情影响而导致的种种困境受到不少代表委员的关注。

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国际高中生,无法返回原就读的国外学校,但所学的课程与国内不兼容,绝大部分都没有国内的学籍,很难转回国内的普通高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建议,分类吸纳消化国际高中生进入国内学校的国际班就读,尽快启动国内国际化教育内循环。

建立留学生回国学习衔接制度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16年至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251.8万人,回国201.3万人。为缓解疫情导致的出国留学受阻问题,教育部推动94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机构和项目临时扩招,共录取3031人。

但对于国际高中生而言,周洪宇发现:家长普遍存在焦虑,孩子在国外的学业没有完成,受疫情影响回来,学习被迫中断了。

周洪宇表示,即使地方政府通过一定程度认定国际高中生拥有 高中同等学力,使之具有高考报名资格,但在当下的高考体系里,并不具有优势,很难考取理想高校。

国际高中生进入国内中外合作高中,将会成为新的选择。目前,国内中

外合作办学的高中已形成完整体系。以武汉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学校为例,其所开设的课程与国外学校同属一个体系,完成学业后可以参加国外高考,拿到国外文凭。

周洪宇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视情调整相关政策,对外合作办学模式适当放开,方便其与国内的国际高中对接,并在学历认证上作出适当调整。另外,需注意中外合作办学招生不能影响高考公平,所录取的国际高中生,未来只能颁发国外文凭。

如今,不少本应在外留学的大学生只能在家中上网课。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副校长杨松表示,疫情常态化下,留学生转学回国的意愿越发迫切,怎样处理归国留学学籍,成为学籍管理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杨松建议,教育部门要鼓励国内高校出台政策,在疫情等特殊情况下接受优质生源回国借读或正式入学;建立国内外高校间学生转学及学分互认的机制;鼓励学生增加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为出国留学受阻的学生提供更多就业选择;学习全球著名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经验,借鉴大学捐赠基金等形式为国内高校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和保障。

周洪宇总结说,我国还要继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力度,构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制度。包括构建国际化背景下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立留学生回国学习衔接制度,为留学生回国继续学业提供制度供给。

学成回国 时间关乎留学生切身利益

而对于即将回国就业的留学生来说,安家之路也没有那么顺畅。

一次与自己学生聊天,让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清华大学社科院教授蔡继明了解到留学生回国就业面临的困境。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大量留学生或因学校关闭、躲避疫情而提前回国;或因国际航班中断、机票昂贵而滞留国内无法回校,不得以网络授课和网络答辩方式完成学业;或在海外拿到毕业文凭后,因国际航班中断、机票昂贵等原因滞留在国外。蔡继明建议,调整疫情期间留学生回国就业落户规定。

蔡继明通过调研发现,根据查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实施办法、官方邮件回复、相关从业人员在网络发布的经验指南以及留学服务中心网站对于两年服务期的解释,可综合得出,对于在毕业前回国的留学生,其学成回国的时间计算起点为入境时间。

相当数量的留学博士生、硕士生不得不提前回国,以网课、网络答辩方式完成学业。而留学服务中心对于此类情况并没有出台新的 学成回国 时间计算方法,只能依照旧例办理,导致这些海归博士、硕士所享有的两年就业落户期限被大大缩短,实际剩余时间甚至可能不足半年。蔡继明说。

蔡继明建议,对非北京、上海户籍留学人员申请办理在京、沪就业落户手续的两年期限,其起始时间的计算办法,应该调整为:从留学生拿到毕业文凭后实际入境的日期算起,或者从留学生在入境后实际拿到毕业文凭的日期算起(以文凭标注的时间为准)。

疫情下,环境倒逼了教育的转型升级。周洪宇认为,我国教育未来可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国际化学习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利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完成基础学习,减少在国外的时间,之后适时出国完成剩余部分的学习。

中也感觉耳目一新。王柯说。有的代表委员还对他们表示,给小程序留言 像给家人写信。

季志业结束与发改委的通话后,感觉自己意见得到了重视。他们很快看到了我的留言,进行了研究,迅速给我回复,不管我的建议能不能被接受、制定有效的方案,这都是疫情背景下行政能力提高的体现。

他们在小程序里与政府对话

(上接5版)

在梳理代表委员留言时,国办工作人员尽量保持内容 原汁原味。留言中,有的代表委员举例、有的算账,信息量丰富,鲜活的细节比较多,便于有关部门更全面地掌握情况,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

提供参考。

有的留言篇幅虽然不长,但从县市级基层视角 关注政府工作,能够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完善、不配套等问题,以小见大 地提出比较具体的意见建议,我们在梳理留言的过程